

魏 晋 书 法 篆 刻 史

傅舟一著

四川美术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四川美术出版社



魏
晋
书
法
篆
刻
史

傅
舟一著

四川美术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书法篆刻史 / 傅舟著. -- 成都 :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10-7284-0

I. ①魏… II. ①傅… III. ①汉字—书法—美术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②篆刻—美术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5512号

魏晋书法篆刻史

WEIJIN SHUFA ZHUANKESHI

傅 舟/著

出品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陈 晶 周谢妮
封面设计	张 勇
责任印制	黎 伟
校 对	谢 容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制 作	成都华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鑫达彩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12.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7284-0
定 价	76.00元

■ 著作权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3225797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001
第一节 魏晋书法的社会文化背景	001
一、魏晋时代王朝更替简况	001
二、魏晋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	002
第二节 魏晋书法的辉煌	004
一、魏晋书法的高峰成就	004
二、魏晋书法的审美特征	006
三、魏晋书法繁荣的原因	010
第二章 曹魏时代的书法	012
第一节 曹魏书法	013
一、曹操与书法及其贡献	013
二、曹操麾下的重要书家	014
三、曹魏时期的名书法家	016
四、曹魏的其他书家	018
第二节 钟繇与楷书的确立	019
一、楷书的产生与钟繇书法	019
二、钟繇生平创作与楷书的确立	021
三、钟繇的书法创作及成就	022
第三节 吴蜀书法	024
一、吴国的书家书作	025
二、蜀国书法	029
第四节 曹魏时代的碑刻书法	031
一、曹魏碑刻	031
二、孙吴碑刻	037

第三章 西晋时代的书法 040

第一节 西晋的文人书法家及书作 040

- 一、一台二妙 043
- 二、陆机与陆云及顾荣 044
- 三、竹林七贤等文学书法家 047
- 四、西晋的家族书法 052
- 五、西晋的王室书法 055
- 六、西晋的其他书法家 056

第二节 魏晋的简牍残纸等墨迹书法 061

- 一、魏晋简牍残纸等墨迹书法简说 061
- 二、魏晋简牍残纸等墨迹书法释例 064

第三节 西晋的碑刻书法 069

- 一、西晋碑刻书法说略 069
- 二、西晋碑刻书法释例 071

第四章 书圣王羲之 078

第一节 王羲之生平创作与思想形态 078

- 一、少年俊才 079
- 二、为官入世 080
- 三、弃官归隐 085

第二节 王羲之书艺的划时代成就 088

- 一、王羲之今体书法的总体成就 088
- 二、王羲之书法代表作释例 095

第三节 王羲之书艺的审美风格及成因 106

- 一、王羲之书艺风格的分期 106
- 二、王羲之书艺的风格特征及成因 108

第四节 王羲之书艺的历史贡献和影响 111

- 一、王羲之书艺的历史贡献 111
- 二、王羲之书艺的深广影响 112

第五章 王献之和东晋其他书法家115

第一节 王献之的书法创新	115
一、王献之的生平与创作	115
二、王献之的书法成就	118
三、王献之代表作释例	121
第二节 东晋家族及文人书法	124
一、东晋家族及文人书法论略	124
二、东晋家族书法	127
三、卫夫人的书法探索	145
四、东晋文人书法家	147
第三节 东晋的碑刻书法	162
一、东晋碑刻书法论略	162
二、东晋碑刻书作释例	163
第四节 十六国书法	171
一、十六国及其书法简况	171
二、十六国碑刻书法释例	172
三、十六国墨迹书法释例	175
四、十六国的文人书法	178
第五节 魏晋时期的书学理论	179
一、魏晋的书学论著	179
二、魏晋书论的美学思想	181

第六章 魏晋时代的篆刻184

第一节 魏晋官印简况	184
一、魏晋官印的典制	184
二、魏晋官印典制简说	185
第二节 魏晋官印的特征及释例	186
一、魏晋官印的特征	186
二、魏晋官印释例	187
三、魏晋时期其他印章说略	190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魏晋书法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魏晋时代王朝更替简况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时代，它是一个大动荡、大紊乱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三大思想解放时期之一；是人与文化的自觉时代；是极端草菅人命又极为重视生命的时代；是最为潇洒出尘又最为悲怆沉重的时代；是人的生命历程相对短暂但又创造了其永恒艺术的时代，比如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是极为放诞不羁又极富于哲学思辨的时代。在这样的文化大氛围中，魏晋风度，任诞品性、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就成为闪烁着熠熠光芒的时代表征。而书法作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化瑰宝，迎来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它孕育于这个时代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深厚土壤之中。

东汉末年的中国大地，群雄纷争、满目疮痍；兵燹战火，几无宁日。然而，在汉末豪强的混战中，也包含着人民求安宁、冀统一的意志。因此，当时某些政治家、军事家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便代表了这种意志。公元208年，曹魏、蜀汉、孙吴鏖战赤壁，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揭开了两汉以后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它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思想文化形态、社会生活状况等方面都大有不同于前后历史时代的历史特征。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汉皇帝，建立蜀国。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于公元229年继皇帝位建立吴国。历史在这里舒缓了60年，三国内部相对稳定，经济略有增长，史称“三国时代”。

魏国自曹操、曹丕死后，蜀汉自诸葛亮死后，吴国自孙权死后，三国即相继衰落。公元238年，司马懿消灭了辽东的公孙渊，统一了中国北方。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巩固了司马氏集团在魏国的势力。公元263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灭蜀汉。公元265年，司马昭死，司马炎废除魏帝、建立晋朝，为晋武帝。公元280年，司马炎出兵20万攻吴，3个月即灭之。中国历史在经历了汉末至三国近百年的纷争割据局面之后，实现了较为短暂的大统一。西晋王朝在短短的五十年里，主要是太康年间，也曾出现过繁荣气象。而魏晋书法史上，西晋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过渡发展阶段。

西晋末年，当晋武帝死后，因杨骏、杨皇后争权，使“八王之乱”在公元

300年起自宫掖。公元304年，刘渊起兵反晋。公元316年，愍帝被俘，西晋即告破亡。同时，在中国北方又有“五胡乱华”，形成五胡十六国大混战的局面，这十六国是：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夏、北燕、北凉。与此同时，还有三个不在十六国之内的政权：代、冉魏、西燕。

当西晋八王之乱时，长江流域相对安定，中原的部分士族与民众即开始渡江避乱。公元307年，晋怀帝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公元317年，司马睿被拥戴为帝，次年正式建立东晋王朝，司马睿即东晋元帝。东晋持续了百余年，比西晋相对稳定繁荣。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制度，形成了豪门大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庄园地主制，形成了东晋特殊的经济体制和文化环境，并促成了东晋书法的辉煌历史。比如王导、谢安、桓温、庾翼四大权臣与司马氏共执朝政。公元404年，东晋政权被藩镇桓玄篡夺，后刘裕杀桓玄复晋安帝，于公元420年灭东晋、建立刘宋王朝，揭开了南朝的历史。

二、魏晋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

从整体上说，魏晋南北朝在秦汉帝国之后，出现了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移的动荡时期。在此时期，分裂中既有矛盾、对抗，也有民族集团间的竞争，既有伤亡与破坏，又有破坏中的建设，既有黑暗，又有光明。纷乱战争中也蕴含着和平与统一。魏晋六朝既不同于两汉，也不同于隋唐，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时代的社会历史特征。首先是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从曹操于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算起，至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589年）灭掉南朝陈而又统一中国止，前后共393年，中国却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北朝、南朝等动荡不安的年代。仅论魏、晋、五胡十六国，仍是朝不虑夕、人命危浅的时代，战争与动乱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显而易见，其中较大的有以下几次：一是公元189—192年间的董卓之乱，几年间豪强割据，互相攻伐，岁无宁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荒寒，人民困苦。二是自公元291年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发生后的十六年间，皇室内部骨肉相残发展为中原北方地区的大混战，生产凋敝、人民流离，出现了胡汉各族的移民大潮。三是起自公元307年的永嘉之乱，在短短6年间，匈奴贵族的铁骑横行于洛阳、长安一带，宫殿、官府被夷为平地，王公庶民被杀达三万多人。刘曜退出长安时，掳掠关中男女八万余口

退往平阳。公元316年，刘曜再次攻入关中，长安城破，晋亡。“人相食，死者太半”，的确，魏晋是一个战乱频仍、朝代更替频繁的动荡时期。

其次是门阀士族政治制度，这是魏晋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门阀士族是一个具有特殊权力的地主阶级，控制着朝廷和地方的大权。所谓门阀士族，是指那些门高第阔、世代官宦之家，也称阀阅世家。按旧时制度，这些显赫大家的门前均立有两根柱子，左边为“阀”，右边为“阅”，用以表示家族的荣耀。自东汉时代的征辟察举制开始，即形成了重视门第的风气。至魏晋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以及占田制、赐客制、荫客制、荫亲属制的规定，使那些经明行修、累世为官的显赫家族，在法律形式上获得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门阀世族之制即正式形成。避乱过江的中原世家大族就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陈留阮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门阀士族政治制度不仅使世家大族享有世代代做大官的特权，而且还可以拥有私人军队——部曲，这些人平时可作劳动人手，有事时也可作荷戈打仗或保卫庄园的武装力量。门阀士族政治制度具有地域性和宗法性相结合的特点，有政治、经济、法律等诸方面的特权，往往控制了朝野大权，士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不利的一面。但它能存在几百年，也有其合理的因素。那些依附于门阀士族的宗族、佃客和部曲，由于门阀士族的庇护，也避免了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这是有利于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我们更要说明的是，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与巩固，世家大族有着极为优越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或书，或画，或文，或史，或玄，他们都能专心和投入，并取得极大的成效。可见，这一时期虽然较为动荡不安，但思想却十分活跃，文化科学事业大有进步，这的确与特殊的门阀士族制度分不开。

三是文化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时期，但实际上在思想文化上的收获，比春秋战国时代要深刻丰富得多。在此时期，儒家的伦理济世之学、玄学家的宇宙本源之学、佛家的思辨哲学、道家的养生之学，以及杨泉的物理论、郭象的独化论、裴頠的崇有论、范缜的神灭论、杨朱的人生哲学等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学说，错综复杂，经过较量和冲突，改造与糅合，逐渐形成了“三教同源”“儒道互补”的新学说。这个理论体系仍不脱离儒家三纲五常的名教，但已赋予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内容。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宋明理学，就是在南北朝“三教圆融”的基础上酝酿出来的。同时，在文学、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就极为突出：“三曹”“七子”为代表的“汉魏风骨”，山水诗、

田园诗及宫体诗，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也为唐代律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文学、艺术、书法的批评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觉、形成乃至成熟的。在艺术与科学方面，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莫不开凿于这一时期，成为举世瞩目的三大艺术宝库。“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以及科学家祖冲之、刘徽、裴秀、皇甫谧、葛洪、贾思勰、蔡母怀文、马均等，他们的光辉成就在中国文化科技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中一些发明创造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因遥遥领先而放射异彩，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特征，不止以上三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如当时新经济地区的开发，十六国时期辽西地区、凉州地区的开发，以及民族的大迁徙与民族的大融合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存在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先进的汉民族文化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化和封建化，促进了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进步，同时也为汉民族增添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活力。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大融合，尤其是文学、书画艺术的南北融合，而这又当辟专题论之了。

第二节 魏晋书法的辉煌

一、魏晋书法的高峰成就

中国书法的发展自三代以降，经春秋战国、两汉三国而至两晋，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时期，书法艺术空前繁荣。首先，作为书法主体的书法家多、流派多。据《佩文斋书画谱》的“书家传”所载，汉代四百年间有书家98人，而晋代一百五十年间则有书家198人。据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统计，从上古至东汉，有主名的书家152人，而从魏到东晋有主名的书家则为284人。书法流派自钟繇、卫觋以下，形成了颇有魏晋文化特色的家族书法流派，著名的有卫门书法、郗门书法、王门书法、谢门书法等，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书法的发展。其次，书法发展到魏晋时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篆、隶、章草书体的时代至此结束，进入楷、行、今草的新时代。同时，在汉碑之后，极大地发展了帖书。从历史文化背景上说，魏晋之际禁止立碑，自汉以来的碑书暂时衰竭，取而代之的是绢纸上的帖书。再加上古书的亡佚和佛教的兴盛，促进了抄书和写经的盛行，这与帖的发展直接相关。从以写碑为主到以写帖为主，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大

转折，它是书法艺术发展新的推动力。另外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也从政治哲学历史文章扩大到文学、书信、日记、问询等，使书法艺术抒写个人思想感情、融合审美趣味的艺术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第三，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魏晋时期进入了全面自觉的状态。这是由于人的自觉带来的哲学、美学、艺术的自觉。统治者的提倡，“书博士”的设立，社会上的普遍宝爱，艺术欣赏的流行，士大夫阶级的习尚，书学理论的探索，思想情感、审美观点和生命意志在作品中的彰显，无不标志着书法艺术在这个时代的自觉。以上诸方面使魏晋书法尤其是东晋书法成为书法史的极盛时期，使“晋字”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同被作为一代文化的典型代表而光耀史册。

具体地说，魏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钟繇、胡昭、韦诞、邯郸淳、梁鹄、卫觊、皇象、卫瓘、索靖、卫恒、陆机、卫夫人、王朮、王羲之、王献之、王荟、王珣、王徽之、庾翼、郗傒、谢安、司马睿、司马昱等等。此期的书作书迹则有文人书作、碑刻书法、残纸、简牍、写本、写经等墨迹、民间书作，以及魏晋官印等。作品数量大、名迹多，杰作累累，实为魏晋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志。文人书法名作如：《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平复帖》《姨母帖》《初月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孔侍中帖》《远宦帖》《神龙本兰亭序》《定武本兰亭序》《十七帖》《黄庭经》《乐毅论》《孝女曹娥碑》《鸭头丸帖》《廿九日帖》《十二月帖》《中秋帖》《送梨帖》《鹅群帖》《地黄汤帖》《新月帖》《伯远帖》《怀妊帖》等等；碑刻名作如：《黄初残碑》《曹真残碑》《鲍寄神坐·鲍捐神坐》《天发神讖碑》《谷朗碑》《杨绍买地冢钉》《谢混墓志》《广武将军碑》《爨宝子碑》《好大王碑》《司马芳残碑》等等；简牍、残纸、经卷等墨迹名作如：《楼兰魏晋简》《泰始九年木简》《李柏文书》《吴书孙权传残卷》《十诵比丘戒本》《晋人写经》《晋阳秋残卷》《残家书·某人启残纸》《秀才对策文》等等；魏晋官印名作如：“虎牙将军章”“武猛校尉”“建春门侯”“巧工司马”“辅国司马”“关中侯印”“牙门将印章”“亲晋王印”“晋率善胡仟长”“邺官监印”“归赵侯印”“右贤王印”等等（这些印均见本书附图）。在上列碑刻书法与简牍、残纸等墨迹中也包括了一些民间书作。总之，以上书家、书作、书迹作为魏晋时代书法的代表，表现出魏晋书法的实绩、总体成就，文人书法的超脱、潇洒、恣肆，碑刻书法的雄浑、峻拔、挺劲，简牍残纸墨迹的真率、鲜活、野逸，合奏出魏晋书法的时代交响曲，响遏历史天空的行云，应和着环宇大地的众妙之音。

二、魏晋书法的审美特征

（一）人与艺的自觉——魏晋书法的美学思想品格

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成为后人仰目而叹为观止的高峰。这一高峰艺术首要的美学特征便是它表现着人与艺术的自觉。魏晋玄学的产生，标志着哲学由汉代的宇宙论转向了人的主体论，极大地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推崇人的性情、品貌、风度、智慧、识鉴、个性、言谈。以哲学为思想基础的艺术也奏响了“人的主题”，“人的自觉”带动了“文的自觉”“艺的自觉”：文学上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绘画上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命题；书法上则宣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这就把艺术提高到一种以人作为表现中心的本质高度。如果说汉代书法那雄强古拙的气势力量表现出人征服并占有外部世界的巨大胜利和乐观精神，那么，魏晋书法则转化为对生命主体自身的关注，呈现为主体的生命意志的彰显。纵观魏晋书法史及书法批评，可知其书法创作大多与书法家本人的风度气质相联系，魏晋人的感情、意志、情趣比他们的先辈更加强烈、更具个性。魏晋书法超逸、潇洒、恣纵的时代韵致，正是魏晋士人风流倜傥、飘逸落拓的人格在艺术上的体现。这正像刘熙载《书概》所谓：“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人之首务也”。虞和在《论书表》中论及魏晋书风的变迁时所说的：“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他把书法风格的变迁与“人情”联系起来，把艺术发展的规律归结到“人情”的本质高度，以阐释“古质”“今妍”之所由来，这对于魏晋书法的审美认识，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再者，魏晋时代随着人性的自觉而形成人格的独立，这可以以魏晋书家对自己书艺充满自信为其表征。如卫恒《四体书势》序中，记载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焚其札”，已见自珍其书的端倪。王羲之曾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王献之的回答谢安“君书何如家尊”的话时，称“固当不同”。二王的话，尤其是小王的话，充满自我意识，传达出强烈的个性，珍视个体风格的差异，不矜承传之能，而尚创造之志。魏晋士人普遍尊崇人的个性，书法家人格的独立，无疑对书艺风格的创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旦书法的点画线条融入了书法主体的个性色彩，书艺风格即告生成。因此说，魏晋书法是魏晋书法家们人格的象征，它奠定于那个时代哲学美学的基础。

（二）创造本质的彰显——魏晋书法的审美主体品格

魏晋的书法家们面对着东汉隶书的煌煌成就，面对刘德升、蔡邕、张芝、

钟繇等大家，要使自己立于中国书法史，就必须以超常的识见才情创造出独具风格的艺术成就。因此，在书法艺术中彰显其创造本质就成为书家主体的首要命题。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无疑是这些富于创造的书法家中的光辉典范。唐朝张怀瓘《书断》评王羲之有云：“备精诸体，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然剖析张公（芝）之草，而复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繇）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得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第180页。）张氏首先肯定了羲之“登峰造极”的成就，并指出这种成就亦源于其天赋才情，即所谓“造化发灵”。更重要的是论及羲之“剖析张公之草”“损益钟君之隶”。王羲之的划时代成就正是他在张芝草书、钟繇楷书基础之上进行了变革、创造、发展，在笔法、布势、神韵上加以本质性的深刻变革，从而创立了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千古法式，变“古质”而为“今妍”，最高地发挥其作为书家主体的创造本质。所谓“愧其精熟”“古雅不逮”正成为羲之创造精神的反证。相对于前代的名家名作而言，成为后世楷范和传统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美学本质，恰恰又是王羲之蔑视权威的创造精神！而王献之的创造精神更胜于乃父。张氏《书断》尝记载献之十五六岁对父亲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王献之又在张芝、乃父行草的基础上创造发展其纵逸跌宕之致，以及如《鸭头丸》帖一类“倾泻式”的章法、气势，将主体的创造本质宣泄得淋漓尽致。王献之既继承前贤的风韵神采，又刻意创造求新。所以张怀瓘又评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遁拔。”（同上）高度肯定了献之的创造精神。南朝宋虞和《论书表》所谓“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历代书法论文选》上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第50页。）既指出了魏晋书法“今妍”的时代特征，也指出了魏晋书法的这种“今妍”特征是在“古质”的基础上创造而至的，是新时代崇尚主体精神情感的审美理想所致。除羲之、献之外，魏晋时代的许多书法家都任天然而自逸，超然绝尘，离世迈俗，表现出自由的创造精神。如汪砢玉《墨花阁杂志》所云：“晋人书，虽非名家，亦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态。盖缘当时之士，以清简相当，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笔散藻，自然可观。”的确，魏晋人书，大都挥洒自由，不拘成法，一任主体创造的天然风致。魏晋书法家这种不拘古法的创造本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正来自于当时追求精神解放、审美观念解放的时代思潮。

（三）晋书尚韵——魏晋书法的审美风格品格

所谓“韵”，就是气韵、韵致、韵度。它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作为审美范畴，既有其广泛的指向，又有其特定的含义。这个特定的含义，是指魏晋书法的时代特征的美学概括。具体地说，它是指魏晋书法超尘绝俗、潇洒飘逸的审美风格，指魏晋书法萧散、简远、自然、平和、恬淡、超逸、蕴藉的艺术特征。魏晋书法的尚韵特征，是由魏晋时代众多的书法家共同创造的，尤其是东晋书法、家族书法、流派书法，它们是尚韵时代的代表。魏晋时代特定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等汇成其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又形成了尚韵的主导潮流，用艺术史家丹纳的话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

关于晋书尚韵，古代史论家多有论及。宋黄庭坚《题绛本法帖》云：“两晋士大夫类能书，笔法皆成就，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日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指明了魏晋书艺评论与人物品鉴的紧密关系，以及“韵”对魏晋人物与书艺的重要价值，否则，难得“仿佛”也。清刘熙载《艺概·书概》评羲之书艺有云：“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以一“韵”字概之。《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二录《逊志斋集》曰：“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潇洒麇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魏晋时代的书家均以潇洒风度相尚。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宝南》也指出了魏晋书艺风格源于魏晋风度：“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

魏晋书法尚韵的审美特征源于其主体的人格精神，尚韵的文化氛围，一句话，源于其“魏晋风度”。也就是说，魏晋书法的韵，与汉代书法的势一样，广泛地联结着、突出地呈现着时代的艺术风格、生命情调及文化精神。若把汉代与魏晋相比，就正像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两汉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动的行为）让位于魏晋的五彩缤纷的人格（静的玄想）。”（《美的历程》，第94页。）晋人晋书之韵，正是从玄静的思辨智慧中徐徐地流淌出来的。也正像宗白华先生在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精辟阐释的那样：“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

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脔，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晋人的书法是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美学散步》，第180—181页。）的确，晋人的精神是哲学的、自由的、解放的。他们阔谈老庄，手挥五弦，志轻庙堂，友朋山川，俯仰自得，以游心太玄，弘扬人格精神，发现自我价值等，种种这些淋漓地表现出晋人的生活态度、文化心理和韵致风度。

（四）演变与发展—魏晋书法的美学史品格

从宏观上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既创造了历史高峰，又具有常与变的特性，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这种演变发展在书法美学史上意义重大。一是篆书、隶书、章草的古体书法时代在此结束，楷书、行书、草书的今体书法在此揭开新的历史的一页。王羲之书法的辉煌成就，即最为本质地表现在这划时代的意义之上。王羲之以他赫赫的今体楷行草的书艺成就将他与以前时代划分开来。同时，在王羲之的身后背景中，屹立着以献之为代表的一大群今体书法家，共同改写了汉代以降的中国书法史。二是近似于意义重大的“隶变”，在魏晋时代书法演变轨迹中形成了“楷变”，由前代的墨迹书法、民间书法以及碑刻书法的隶书、章草演变出楷书，并且在钟繇、王羲之的手中得以确立。这种“楷变”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魏晋书法的演变发展，具体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表现在书法创作上，法帖、碑刻、墨迹等书迹中书体的演变与发展。在众多书迹中的字体、点划、结构、笔调、章法、风格、审美旨趣等诸方面，既呈示着古质，又蕴含着今韵；既具有篆、隶、章草等古体书的风范，又流露出楷、行、草书等今体书法的法式。或为以隶为主的隶楷体，或为以楷为主的楷隶体。总之，都表现出演变、发展的时代特征。其次，许多书家都处在书体变革承传的关键环节上，成为书法演变中的转捩似的人物。他们既承继着秦汉时代的书法成就和艺术特征，又开启着后代许多重要书法家的书法创作。如钟繇、卫瓘、索靖、卫恒、陆机、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等等。三是书家主体的“一专多能”似的艺术造诣，许多书家既能篆、隶、章等古体，又擅楷、行、草等今体，并加以演变和发展。这自然以羲献父子为主要代表。其他书家则有造诣和技能的高下宽窄之别。这也表现着魏晋书法承传演变的时代特征。

同样，在书法批评中也呈现出魏晋书法演变发展的审美特征。魏晋六朝批评家所注重并引为楷范大加称赞的，多是钟张二王之流能够体现时代审美精神的新

书流派及其作品，很少“言必称仓颉、史籀”的现象。如南梁庾肩吾《书品》，在阐述书法新变的意义时指出：“变通不极，日用无穷，与圣同功，参神并用。”又说：“惟草正疏通，专行于世，其或继之者，虽百代可知。”按这种观念，他把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并列上上品。可见其对魏晋书法发展演变重视之一斑。

三、魏晋书法繁荣的原因

任何文学艺术门类的繁荣与辉煌的原因，一般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其内部的原因，二是其外部的原因。只是在内外的两大方面又可能有若干层面。魏晋书法的繁荣与辉煌的原因，数列起来大致有以下方面：一是书家主体的自觉意识以及才学识情，并与此相连的魏晋风度、魏晋韵致；二是书体演变发展的规律；三是书法技巧的演变和书家对此的探索、研究；四是书法批评的推动；五是文化氛围的促进，如哲学思想的影响、宗教的兴盛及影响等；六是社会对书法的宝爱风气；七是统治者的重视、提倡等等。可以看出，前三者是魏晋书法繁荣辉煌的内部原因，后四者是其外部原因。关于前三者原因，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中有一段归纳，较为准确中肯，故录之：

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夷考其故，盖有三焉，一则时接汉魏，诸体翻备，无烦极虑，便可兼通，择要而从，尤易专擅，不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济成厥美，亦固其所。一则隶奇草圣，笔迹多传，服拟有资，师承非远，酌其余烈，自得新裁，挹彼遗规，成吾楷则，信挺埴之罔穷，斯挥运之入化，虽日前修已妙，转觉后出弥妍。一则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惊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锋杪，或赏析于豪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莫与抗行矣。

马氏所列第三点，实应为第一重要原因，即书家主体的自觉，魏晋尚韵、尚清诗、尚书法的时代潮流。也就是魏晋士人把自身的觉醒、思想解放付诸行动，追求人的自然本性，追求人格自由和个性独立，蔑视礼法、庙堂，志在山林、通脱旷达，在智行两大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可以说，这是魏晋书法繁荣与辉煌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魏晋前诸种书体已较为完备、发展、创造的条件极佳，可以“择要而从”，易于专擅。第三个原因是技法演变，化前代之古质而成今时之妍美，“挹彼遗规，成为楷则”。第四是书法批评的促进。卫恒、卫

夫人、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理论都做出了时代性的贡献，推进了当时的书法创作。

其他外部原因如宗教的兴盛对魏晋书法的繁荣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既造就了一大批作为书法主体的“经生”，也产生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即“写经”之作。至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从某一侧面亦可归入社会上宝爱书法的风气这一方面。社会宝爱的风气在魏晋时代极为突出，为推动魏晋书法繁荣与辉煌的重要的外部原因。虞和《论书表》即记述了东晋贵族桓玄、刘毅、卢循等对名家书法的酷爱，至于“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新渝惠侯对于二王法帖，更是“悬金招买，不计贵贱”。在魏晋六朝的约三百年间，上至帝王，下至一般读书人，无不喜爱书法，以擅书为时尚。曹操、晋简文帝、东晋元帝、王导、王廙等等无不珍爱名家法书。总而言之，魏晋书法的繁荣辉煌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及书法自身演变发展的原因。